

# 《庄周故里辨》商榷

刘 文 刚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庄子为蒙人，向无异说。但蒙在什么地方，故城是在今天的河南商丘东北，还是在今天的安徽蒙城县？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十期发表的非铭同志《庄周故里辨》，经过一番考证，说：“庄子故里为今之安徽蒙城应当确信不疑了。”他还认为这篇文章出来后，“关于庄子故里的争论似乎可以结束了”。但读了这篇文章，实在不能信服，看来说要结束这个争论，还为时过早。

《庄周故里辨》说：“迄今为止，人们多以为庄周故里是河南归德（今商丘）之蒙泽（位于商丘东北，今县名已废）。此说盖起于明代。”说人们多以为商丘东北是庄子故里，这是对的；说“此说盖起于明代”，那就不对了。

早在汉代，刘向《别录》就说：“庄子，宋之蒙人也。”（司马贞《史记索隐》引）今之河南商丘，庄子在世时属宋（宋亡后方属楚）；而今之安徽蒙城，原为楚地。刘向说“宋之蒙人”，就是说他的故里蒙县在今天的河南商丘东北。

后魏酈道元《水经注·坂水篇》说：“坂水又东经蒙县故城北，俗谓之小蒙城也。《西征记》：城在坂水南十五里，即庄子之本邑也。为漆园吏。郭景纯所谓‘漆园有傲吏’（按：此郭璞《游仙诗》句）者也。悼惠施之没杜门于此矣。”《西征记》是东晋戴延之的纪行之作（见《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他到过蒙，他的记载很值得注意。

唐人也认为今之商丘东北是庄子的故里。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庄子者，姓庄，名周，梁国蒙县人。”成玄英《庄子疏序》说：“其人姓庄，名周，字子休，生宋国睢阳蒙县。”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说得更详细了。《寰宇记》的《河南道·宋州》“人物”条下说：“庄周，宋蒙人。不以祸福累心。为漆园吏。楚威王以千金币迎周，不应，钓于濮水。”又“宋城县”条下说：“本宋国蒙县，以宋公及诸侯盟于蒙门而为县名。……小蒙故城在县南十五里。六国时楚有蒙县，俗谓小蒙城，即庄周之本邑。今复有大蒙城在县北四十一里。”祝穆《方輿胜览》“宋城”条下也记载：“考城东有蒙泽，庄周故里。”从汉到宋的大量材料，都说明庄周故里所在的蒙在河南，怎么能说“此说盖起于明代”呢？

说明庄周故里所在的最有力的材料是《庄子》一书本身。从《庄子》看，庄子交游过从的惠施、商太宰荡、宋荣子都是宋国人。庄子一生多在家乡和家乡附近活动，其中还提到“商之丘”（即今河南商丘），可见他也是宋人。《庄子·列御寇》说：“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悦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曹商从宋国到秦国去，回宋国又见到庄子，说明庄子居住在宋国。《列御寇》又说：“人有见宋王者，锡车十乘，以其十乘骄稚庄子。”从宋王那里得车骄稚庄子，也说明庄子居于宋国。《列御寇》

是庄子的后学所作，虽属寓言，亦当不无根据。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庄子故里辨》的“考证”吧。

《庄周故里辨》说：“据考，蒙城殷商名北冢，周、春秋称北楚漆园，秦属阳郡，汉分西北境为梁国蒙县（北冢合为“蒙”，即蒙城之由来），东南境沛郡山桑；东魏合蒙县、山桑置为蒙郡，后齐复为蒙县，唐天宝元年改称蒙城，延续至今。”“北冢”合为“蒙”，有何依据？庄周为“蒙漆园吏”，而《庄周故里辨》引《史记》时，故意略去“蒙”字，在此却说“周、春秋”有所谓“北楚漆园”，而这个“漆园”汉代又分为“梁国蒙县”和“沛郡山桑”。果真如此，庄周这个“漆园吏”，也算一个辖地方数百里的封君了。但究竟又有何根据呢？

按，《汉书·地理志》：蒙（在今河南商丘东北）属梁国，梁国八县中列第四；山桑（即今之安徽蒙城县）属沛郡，沛郡三十七县中列第十六。《续汉书·郡国志》：蒙在豫州梁国，梁国九城中列第五城（惠栋《后汉书补注》指出，此即刘向《别录》所说的“庄子，宋之蒙人”的蒙）。山桑在豫州汝南郡，汝南郡三十七城中列第三十六。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指出，山桑在魏、晋属谯郡。庄周故里和安徽蒙城县本来没有关系，因为在汉、魏及晋初，今天安徽的蒙城还叫山桑，而不叫蒙城。安徽蒙城的得名大概是这样的：现在河南的蒙在西晋怀帝永嘉五年（三一—）被石勒攻陷，城废。（《晋书·孝怀帝纪》：“石勒袭夏阳，至于蒙城，大将军苟晞、豫章王端并没于贼。”《石勒载记》也有同样的记载。）以后，“豫州没于石氏。”（见《晋书·地理志》）下至魏、齐，豫州均属北朝。当时的蒙县故城和山桑，均在豫州之域，魏孝文帝太和七年（四八三），乃在山桑筑南、北蒙城。《太平寰宇记·亳州》“山桑”下说：“南、北蒙城并在县北八十里，相去四十步，皆自后魏孝文帝太和七年筑之，至东魏武定六年置郡，齐天宝七年废郡为蒙城，唐武德五年又置为郡，开元中废”。到了唐天宝元年（七四三），就正式改山桑为蒙城了。（《旧唐书·地理志》“亳州”下说：“蒙城，隋山桑县，属谯州，州废，隶亳州，天宝元年，改为蒙城”。）由此可知，说今天的安徽蒙城是庄周故里，是错误的。

《庄周故里辨》说：“王竟（按：应为王兢）作过秘书丞，即管理文书档案的官吏；苏东坡又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他们一个为庄子建祠，一个为庄子写记，都把蒙城当作庄子故里，想不会没有根据。”王兢确实为庄子建过祠，但他又何尝不可能是借此替地方作些点缀，为自己留名。至于苏轼的《庄子祠堂记》，是“求文以为记”的应酬之作，不是考据文章。苏轼借此发挥他对庄子的看法。对于安徽蒙城是不是庄子的故里，他不置一辞，看来态度还是很审慎的。

《庄周故里辨》还有一个根据是，“开封进士苏舜钦（字子美）接任为蒙城县令。此人更是慷慨好古，工诗文，善书法，与宋代另一位大学问家王安石互有来往，……苏舜钦为蒙令时居县衙后宅，立匾曰‘清燕堂’，特请王安石为之题了诗，诗亦名清燕堂。”苏舜钦作蒙城县令，《宋史》本传没有记载。据欧阳修《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和苏舜钦《亡妻郑氏墓志铭》，他的确做过蒙城县令。苏舜钦（一〇〇八—一〇四八）作蒙城县令，大概是景祐元年到二年（一〇三四—一〇三五，参看沈文倬校点《苏舜钦集》所附《年谱》），那时生于天禧五年（一〇二一）的王安石仅仅是十四岁的孩子，怎么会给苏舜钦题诗呢？就算他是神童吧，苏舜钦也并不认识他呀！王安石是写过清燕堂诗的，但诗中并未提到苏舜钦，而诗名也叫《蒙城清燕堂》。这首诗的“吏无田甲当时气，民有庄周后世风”一联，不仅弄错了庄周的故

（下转第5页）

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正确地分析了国内阶级状况，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及时地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但是，后来并没有实现这个转移。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我们认为主要的是违背了“八大”对阶级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认为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并且对我国一九五六年以后的阶级关系作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估量，把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强调到了违反实际情况的程度，从而在“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形势下，一次又一次地发动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严重地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破坏了社会生产力。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一九五六年，当国际上反动势力掀起一股反共逆流，国内的右派分子与其相呼应，向无产阶级、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的时候，我们把这种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好象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结果在一九五七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接着在一九五九年又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了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一伙祸国殃民的反革命利用了我们的错误，打着“高举”的旗号，唱着“念念不忘”的高调，推行一条极左路线，制造大量的错案、假案、冤案，使党和国家处于激烈的震荡和颠簸之中，国民经济陷于全面崩溃的边缘，中国人民遭到一场空前的浩劫。沉痛的教训说明：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和估量阶级状况，认清社会的主要矛盾，正确处理阶级斗争问题，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兴亡成败的大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粉碎“四人帮”以来形势的发展，决定把党的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明确指出：“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已经消灭”，“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也已经不再存在”，“今后再不需要也再也不应该进行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这是“八大”精神的继续和在新形势下的发展。这样一个认识来得多么不容易啊！我们为此而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是二十多年来我们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总结，也是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斗争的结果。我们一要牢牢记住夸大阶级斗争的沉痛教训，紧紧抓住当前的主要矛盾，排除干扰，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

（上接第27页）

里，而且把韩安国坐法抵罪的梁国蒙县，也随便安在本是沛郡山桑的亳州蒙城了（见李壁注引《汉书·韩安国传》颜师古注）。这是借题作诗，与考据文章，本不相同。也正象苏轼有《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人们不能因此便把黄州的赤鼻矶当成是曹操和孙权大战的嘉鱼的赤壁的证据一样。

总之，庄周故里是今之河南商丘东北，而不是安徽蒙城县。人们所以把它说成安徽蒙城，或者由于弄不清地名的变迁，或者象《庄周故里辨》所说，“为了争荣”。而《庄周故里辨》所引的那些地方志，实际上便属于后者。“为了争荣”，他们不惜伪造史料（如“北冢合为蒙”、“北楚漆园”之类），歪曲历史（如苏舜钦请王安石作诗之类），本来是毫不足信的。